

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意识

何 国 瑞

文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含物质文化、人身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交流即不同人群关于人化产品和人化活动的互换互往。中外文化交流远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直到17、18世纪,我国文化一直处于交流中的主动地位,大为西欧文化精英所崇拜。此后一个时期则处于被动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进入了交流的最好时期。要取得交流的最好效果,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有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分别。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必须排除“死守传统,盲目排外”和“鄙弃传统,西化崇洋”这两种病态的主体意识,当前主要注意后者。我们要站在中国人民的本体上,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外国,既吸取又给予,做到中为外用,洋为中用。

—

何谓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在与环境的矛盾斗争中努力求得身心与之平衡发展的活动及其结果。它是一个不断运动、永无终止的巨型系统。自人类诞生起,到只要人类存在止,它就将累进式地从质和量上向深广发展。

从横断面看,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人身文化。三者以物质文化为基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从纵剖面看,它经历了石器文化、青铜文化、铁器文化、机器文化、电子文化。后者总以前者为前提、出发点,在批判继承和革新创造中发展。

可以说,文化就是人化,是人在愈益自觉地求得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促使环境朝着更快地和更普遍地满足人的需要的方向的转化。

二

文化交流是指不同人群中关于人化产品和人化活动的互换、对话和来往。人群,或指氏族、部落、民族,或指阶级、国家、国家集团。

人类最早的文化交流是物质文化的交流,人类迄今最大的文化交流也是关于物质生产的。

• 本文为作者应邀为澳门1993年东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

但在文明社会(阶级社会)里,精神文化的交流愈益受到双方的重视,愈占有重要地位。

人类文化交流的方式,有平等互利的,有强迫给予和掠夺的,有宗教灌输的,有欺诈的,有主动自觉的,有盲目被动的。

交流的结果,一般来说,总是会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促进交流双方或诸方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各自的进步。但在历史和现实中,也有因交流(战争强迫、精神侵袭、盲目照搬等)而出现停滞和暂时倒退的情况。

三

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远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当时华夏的丝绸,经中亚诸国的中介,辗转传入了古希腊,成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衣料。这从巴特农神庙中的“命运女神”等塑像上所穿的有透明轻柔质感的丝织物上可以证明,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有丝织业。

汉代张骞于公元前2世纪,两次出使西域,直接开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唐初,7世纪,玄奘赴西域,出访印度诸国,取经讲学,历时18年,极大地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整个汉唐,以中原为主体,广采众纳,刚健雄强,博收文化交流之妙。

元代,13世纪,成吉思汗等进行了三次西征,以侵略战争的方式促进了中国和欧洲的全面大交流,对中国特别是欧洲的文化发展起了巨大作用。随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大都(北京),在中国游历、居住17年,于13世纪末返回威尼斯故乡。他的行动及游记在西欧引起震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明清,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海上交通。葡萄牙人最早于1557年被准许在澳门通商。稍后,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宣传欧洲文物典章制度,介绍西方的数理化、天文知识,与当时的名公巨卿徐光启等交善,研习译介中国儒学,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端绪。

与此同时,荷兰、英国紧跟葡萄牙,来到中国广州等地,在贸易中将中国商品运到欧洲,引起震动;加上来华传教士返回欧洲故土的书信、报导和对儒家经典的译介,中国文化激起了朝野上下广泛的兴趣。到18世纪以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为中心兴起了一股“中国热”。欧洲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中国儒学的天道观和伦理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年)笃信中国精神文化。他在《中国近况·序言》中,借重中国文化以批判基督教文化:“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法国的伏尔泰(1694—1778)在《哲学辞典》里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还讽刺自以为最高文明者的基督徒,说当中国早已是文明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法国霍尔巴哈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政府为模范。”^②欧洲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也深受儒学影响,被誉为“欧洲的孔子”。元杂剧《赵氏孤儿》于18世纪30年代传入法国,并被多次改编在英法等国的舞台上演出,对欧洲的艺术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英国通过鸦片战争,用大炮炸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17、18世纪的平等交流不复存在。西方文化采用软硬两手侵袭中国^③。面对这种不能拒食的“西餐”,中国人在血泪中吞咽、呕吐、反抗。但不管主客体双方主观动机和感情经历如何,其客观结果是,它极大激发了中国有识之士“振作志气,爱国保种”^④的雪耻精神,中国文化也终于改变了单一的封建性

质,改变了死水一潭的停滞状态。

20世纪初,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主动吸取西方进步文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虽然备受西方国家封锁,但仍尽可能开辟了中西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交流的新局面,翻译出版了苏俄、欧美等大量著作。可惜的是,由于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原因,尔后渐渐发展到“文革”时期,我国重又趋向“闭关自守”,“四人帮”乃至视一切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为祸水尤物,鼓吹要与之“彻底决裂”。

70年代末结束“文革”灾难,新时期改革开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从此进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好时期。当然,要真正取得交流的最佳效果,还要切实排除现实已经存在和将来可能产生的种种干扰。否则,机遇虽好,后果也可能是不妙的。

四

排除干扰,关键是培养和树立文化交流中的健全的主体意识。

何谓主体意识?文化交流中双方或诸方一般互为主客体。主体在交流中多是主动的,当这种主动性提高到相当的自觉程度时,就成为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不等于主体性。主体性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必然自发性,主体意识则是一种自觉自由性。

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意识有层次的不同和性质的不同。

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主体自觉程度有差异而存在的不同层次:1. 或能意识到交流的目的,对彼此文化的现状、过去和优劣、长短等有不同程度的了解;2. 或还能设计交流的方式,组织交流的活动;3. 或更能预测交流的后果,力避其负面值,力争其正面值。这三个层次彼此有一定联系,但又有区别,是层层递进的,标志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主体意识的强弱。二是因主体范围大小有别而存在的不同层次:1. 个体的;2. 集团的;3. 阶级的;4. 人民的;5. 民族的;6. 国家的。这两个方面不同层次的主体意识,愈高就愈难达到,愈难树立。

主体意识性质不同,是由其内容的不同质态决定的。或健康,或病态;或进步,或落后;或革命,或反动;或科学,或迷妄;或唯物,或唯心;等等。这种主体意识性质的不同,就使文化交流必然产生种种矛盾斗争和后果效应。

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中,主体意识是愈益自觉、愈益提高、愈益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其质态则以曲折的方式,不平衡地随历史发展而向前演变。文化交流中双方的主体意识愈是高层次且愈是健全的、进步的、科学的,文化交流活动就愈是和谐的、平等的,交流的结果就愈能促进双方文化的繁荣,愈能使人在与环境的矛盾中处于和谐的状态,愈有利于人类的进步。

五

目前,我国大陆正处于进一步改革开放之中,对外实行全面的文化交流。此时此刻,培育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自清代中期以来,西方文化以宗教渗透和大炮轰入的方式倾销我国。我国由此产生了中西关系的论争,迄今也并未消泯。这中间产生了种种不正常的主体意识。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

一是死守传统,盲目排外。康熙初年,围绕中西“历法”之争,朝廷大吏杨光先认为:“中国乃

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圣君而采用天主教之历？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洋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他竟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真是荒谬之极。“文革”中张春桥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是同一个愚顽的论调。大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开始一段时期，也曾有人表现了类似的态度，一概否定、排拒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现代派文学艺术，认为它们无益而只能有害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些死守传统者还表现出十足的阿 Q 精神。梁启超曾指出：“清季承学之士，喜言西学中国所固有。”^⑧光绪年间一官吏的奏疏中就说：“西学之擅长者……所学固中国所有。”^⑨80 年代初，内地也曾有学者宣称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在我国先秦就有，《庄子》就是。清末甚至还有人鼓吹，西方想“以巧胜我”，我可以拙制之，“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⑩这些人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认为“以机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习为骄惰。”^⑪这种极其愚昧的态度只能使中国文化单系繁殖，愈衍愈弱。

二是鄙弃传统，西化崇洋。这不是产生在封建帝政之时。始作俑者，当推胡适吧？在“五·四”运动中，反对封建文化，剔除其糟粕，学习西方进步文化以自新自强，这是对的；但当时胡适却痛骂中华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民族。”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唯有如此认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⑫这论调至今仍有人鼓吹，不仅大陆有，台湾有，外籍华人中也有。大陆前些年这种声浪甚高。有的宣称，华夏文化是大陆文化、黄色文化，是死文化；欧美文化是海洋文化、兰色文化，是活文化，必须抛弃黄色文化，接受兰色文化，否则中国将要被开除球籍。《《河殇》》说：必须“造成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的幻灭和绝望的冲击”，必须“用世界（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解救“传统文化所造成的生命力阳萎”。台湾持这论调者也颇有其人。或称中国文化是沉浸着许多死猫、死耗子的“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出路只有用“西方现代文明”来“猛撞酱缸”，要“绝对崇拜”^⑬。或谓：我国“固有文化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只好送进了博物馆”，“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⑭。华裔美籍人中也有著书立说的，在貌似平和的“学术研究”中，漫溢出一股咒祖崇洋的冷气。论者从所谓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来对比中西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因此“不断追求变动，而变动又总是导向超越与进步”；中国文化的目的意向性则是“维持深层结构之平稳与不变”，表层结构虽可有所谓变动，但这“任何”“变动”总不能导致“进步与超越”。于是中国文化被目之为“杀子文化”。^⑮

我们必须反对和清除这两种主体意识。

首先，它们违反客观实际。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只要它能在与环境的矛盾中克服困难，生存下来，其文化就必有优点长处。中华文化，是世界四大文化源头之一，直到 18 世纪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此后，虽然发展缓慢了、落后了，特别在物质文化方面；但是，它绝不是完全停止了进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时，中华文化仍在给外国文化以积极有力的影响。日本等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腾飞就与创造性地吸收中国儒学有关；美国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从 20 年代至今不衰，就是“处在中国诗决定性影响之下”（意象派主将庞德语）产生的；德国布莱希特的影响世界的戏剧革命也是在受到中国京剧艺术启发后进行的。如此种种，以致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因此竟说出这样我们也未必完全同意的话来（当然或许他是就狭义的文化说的）：“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⑯而西方现代文化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也是很多很多

的,并且实际上也给我们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积极有益的东西。

其次,它们有碍和有害于中西文化交流。既然一种绝对的好,另一种绝对的坏,那还有什么交流的必要性?既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性能命定是维持其不变,那西方文化再好,对它也就是无能为力的了。汤因比说:“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与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超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⑧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绝对好,绝对坏,双方就不会有挑战、应战的事。在这种意识之下,如有什么“交流”的话,要么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的,其流毒至今,人们常可见大陆一些通衢大埠上招摇于市的“电脑算命”的玩意儿,要么就是甘作西崽,就可能像当代英国一学者所公正指出的,自己受“西方化的诱惑,歪曲了发展的目标,”^⑨被人摄了魂去。

我们所需要的是雄强的、健康的、进步的主体意识。

这种主体意识在我国的先哲中已有所阐发和论立。明末的徐光启(1562——1633)面对着两种极端,一是盲目排外,一是想以十字架征服中国,清醒地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综合”的主张。本世纪初,鲁迅大声向国人呼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⑩在30年代他提出了有名的“拿来主义”,要求我们自己的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要运用脑髓,”大胆择取外国文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⑪

时至今日,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时候,各国各民族,无不处在既日益频繁交往、又日益激烈竞争之中。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今中国广大人民及海外华人的本体上,然后一手伸向传统文化,一手伸向外国文化,既吸取,又给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用于外,洋中有我,我中有洋。这样,华夏文化,自能新生繁昌;西方文化,亦得补益滋盛。

注 释:

① 霍尔巴哈:《社会体系》第1卷。

② 软的一手是宗教麻醉和征服。鸦片战争中来华传教的普鲁士人郭实腊说:“中国的龙要被废止……基督教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转引《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第59页)

③ 林纾:《黑奴呼天录·跋》。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⑤ 屠守仁:《屠光禄疏稿》卷四。

⑥ 俞樾:《治学下》。

⑦ 张自牧:《瀛海论》。

⑧ 《胡适文存》

⑨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3、161页。

⑩ 李敖:《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台湾文星书店1964年版,第17、33页。

⑪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香港堂山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对孙这种讹见,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曾专门写了《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文予以驳辩。指出:要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大陆、台、港、澳、海外的中国人“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大陆与海外——传统的反省与转化》,台湾1989年版)

⑫ 美国《思潮》月刊,1974年第9期。

⑬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页。

⑭ 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煌)